

## 壹、緒論

二十一世紀社會所要培養的學生，不再僅是會獲取大量知識，而是要能學習如何學習。因此，在此脈絡下，教師也必須是一位持續學習者，且能成為引導學生的重要他者。有關教師學習的論述，在過去所談的多是「專業發展」、「專業成長」，但因應時代的變化，西方到1990年代開始倡議「教師學習」（Wilson & Berne, 1999）。Fullan（2007）甚至提出「專業發展」減低了謀求改變的壓力，是阻礙教師學習的詞彙，故主張拋棄「專業發展」一詞，讓專業學習成為教育者每日的經驗。只是，這樣的發展在臺灣較晚，隨著佐藤學（2006/2012a）《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一書在臺的出版，他所籲求的學校每一位成員都是學習者及教師是學習專家，在近幾年方獲得迴響，教師學習於是成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新語彙。尤其日本傳統的授業研究（Isoda, 2011）因為佐藤學而在臺灣廣受矚目，教師公開觀／議課乃逐步在校園中推展開來。

為了本土化佐藤學的論述與實踐，曾有學者以學習領導為上位概念，以學習共同體為操作形式，提出「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在地模式；其中，教師學習共同體部分，融會西方主張、日本授業研究與佐藤學論述，以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觀課、共同議課）作為教師共學的重要媒介（潘慧玲、李麗君、黃淑馨、余霖、薛雅慈，2014，2016；潘慧玲、黃淑馨、李麗君、余霖、劉秀嫻、薛雅慈，2015）。經過幾年的嘗試，現今備課、觀課與議課已是校園中習用的名詞，惟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對於中小學每位教師每學年均需公開授課的規範，這些名詞如何能化為實踐，是需要努力的。備課、觀課與議課是教師專業學習的重要途徑，教師若能藉之產生行動探究的循環，將能活化教學生態，且在實踐社群中，透過真實的（authentic）課堂情境進行脈絡化共學，不僅可重塑自己的專業認同（Wenger, 2012），也可學習、生產在地的實踐知識（knowledge-of-practice）（Cochran-Smith & Lytle, 1999）。在這樣一個可以不斷感受活水挹注，並找到意義感的學校生態中，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規定的公開授課才有可能發揮其實質功能，而不是僅為了符合規定而行禮如儀的「額外負擔」。

有鑑於課堂教學研究在上述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脈絡中的重要性，本研究乃欲以之為探究客體，檢視校長的領導作為如何帶動教師進行課堂教學研究。探討時，本研究不採傳統的校長直接影響效果之模式，而以中介模式進行分析，以掌握校長可能產生的直接與間接的影響作用。針對本研究在選擇探討焦點與分析影響效果的考量上，先作以下之說明。首先，身為學校領航者的校長，其影響學校發展的探討，素受學者之青睞（Leithwood, Patten, & Jantzi, 2010; Sebastian & Allensworth, 2012; Silins & Mulford, 2004）。尤其，校長領導對於學生學習的作用，呈現出顯著的間接效果，而其中校長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媒介（Robinson, Lloyd, & Rowe, 2008），故校長領導與教師學習成為本研究關懷的兩個重要變項。其次，隨著學生學習表現的國際評比在全球備受重視，且在分權化的教改趨勢下，強調學習與講求權力分享的學習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成為新世紀教育領導的新典範（Hallinger, 2011），故本研究選擇了學習領導作為探討焦點，且不僅針對校長學習領導，教師學習領導也在探討之列。此外，從過往的領導相關研究中，發現校長通常是透過學校歷程與情境而影響學生學習（Hallinger & Heck, 1996, 1998; Leithwood & Jantzi, 2006; Leithwood, Harris, & Hopkins, 2008）。而對於教師的影響，則除了有直接的作用力，亦有透過同儕影響或教師態度（如效能感、能動性、承諾等）造成的間接作用力（Al-Mahdy, Emam, & Hallinger, 2018; Hallinger, Piyaman, & Viseshsiri, 2017; Kulophas, Hallinger, Ruengtrakul, & Wongwanich, 2018; Supovitz, Sirinides, & May, 2010）。因之，本研所欲了解的，包括校長學習領導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情形，而在間接影響的探討上，選擇反映同儕影響的教師學習領導，以及反映教師態度的教師效能感，作為兩個中介變項。最後，教師專業學習的方式良多，近年許多學者呼籲植基於真實情境的學習，所產生的效果最好（Darling-Hammond & Richardson, 2009; Louis & Kruse, 1995），故本研究以近年在臺灣逐步開展的課堂教學研究作為測量教師專業學習之指標。綜言之，為檢視教師致力於課堂教學研究的學習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以及如何被影響，除以校長學習領導作為首要的自變項，檢視其發揮直接作用的強弱，也關注校長如何透過教師學習領導及教師效能感促進教師的共學。本研究所進行的上述探討，一方面有別於傳統的直接影響效果模式，採用了中介模式，較能捕捉校長的學習領導對於教師